

红色旅游『严肃』『活泼』可兼得

简言之

日前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的意见》让红色旅游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种关注,一方面源于当前火热开展的红色旅游业和显而易见的政府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游客对提升当前红色旅游质量的迫切期待。

新需求对红色旅游提出了新课题。数据显示,当前红色旅游的主体人群已经从“银发族”变为平均年龄28岁的群体,并且青少年群体占比越来越高。他们有着年轻、学历高、思维活跃等特点,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对旅游体验的要求都更高,对自驾游、沉浸式游览等新方式已经“司空见惯”。

这要求红色旅游坚持“严肃”和“活泼”并重。

红色旅游是有其固有特点的。红色旅游的核心资源不是自然景色,不是名胜古迹,而是千千万万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遗产。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革命专题博物馆和纪念馆808家、登记革命旧址、遗址33315处,抗战文物3000多处,长征文物1600多处……这些数字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我们应当珍而重之,工作不能有一丝毫懈怠。

红色旅游首重教育职能,要让游客通过参加红色旅游真正感受革命历史文化,领略革命历史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就要求红色旅游坚持“严肃”,避免低俗、庸俗、恶俗现象的发生。有些红色景区对党史、军史的描述趋于“戏说”,对革命先辈的逸闻趣事偏向“演义”,存在套路化、娱乐化、庸俗化倾向,导致游客的严重不满,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好的引导;某红色景区有游客换上日军、伪军服装嬉笑拍照,某红色景区有身着红军服装的受训干部衣冠不整,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管理单位的缺位、失位,不仅是疏于管理的问题,也是思想走偏的表现。

时代的发展和游客的变化,要求我们“寓教于乐”。互动性、趣味性等已经成为对红色旅游客观的要求。有的红色

景区片面追求景区建设的“高大上”,动辄新建规模巨大的展馆,却缺乏文物和内涵,甚至将展板作为主体;有的红色景区旅游产品单一,导致“一张桌子一张凳,两块床板一盏灯,游客进门就转身”……这和当前旅游界的各种新方式、新动态相比,显然是不够的,是不能满足游客需求的。

业界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的是惯性导致的老问题,有的是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矛盾。新时代要求红色旅游业有新认识,有新作为。

“严肃”能确保红色旅游不跑偏,推进对红色文物的保护、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活泼”可以提高红色旅游的质量,让游客更好地体验革命历史文化,避免红色旅游陷入形式主义,也可以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坚持“严肃”“活泼”并不难。厘清历史事实,将讲解词的学术性提高,严谨度加强,并不难;加强对红色文物的挖掘、保护、利用,推出更多更好的展览,也不难;加强景区管理,塑造良好的氛围,还是不难。同样的,引入新型展陈方式,开拓业务类型等,也有着国内外诸多先进经验可供借鉴。难的只是要让有关部门切实提高主观能动性,增强业务素质,收到实效。

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设计了不同主题的修身课程,将研学旅行打造为景区的品牌项目;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与外省市区合作开办青年文创设计、扶贫等活动,让纪念馆不仅仅是参观地;上海采用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游客化身“情报人员”进入毛泽东旧居、蔡元培故居等寻找“接头暗号”;云南将大理、丽江等知名旅游地和红色旅游景区结合,丰富了旅游线路、提高了游客兴趣……这些探索已经颇具效果,也说明“严肃”和“活泼”可以兼得。

红色旅游在国民教育、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其效果也正日益显现。在新时代,用“严肃”保证红色旅游发挥正确的引导、教化作用,以“活泼”提高红色旅游的效果,让红色旅游深入人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样可以期待。

不可让瓦片经济唱独角戏

红子

近几年,北京推行一城三带文化建 设。作为从小在北京东南郊长大的北京人,我对大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开发与建设格外关注,一直想就北京城到通州之间的萧太后河、通惠河和坝河做一番文化考察,看看这三条河沿线究竟有多少大运河的文化遗存。

熟悉北京城历史的人都知道,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通州张家湾全长1700多公里,沿途经过35个城市。通州张家湾过去是从南方到北方最重要的大码头。不论从哪里来的船只,到了张家湾,就等于到了北京城。从张家湾到北京城,清末以前,一直走的是水路,也就是走萧太后河、通惠河和坝河,这三条河是名副其实的运粮河,其作用绝不是为了农田水利灌溉和城市泄洪。我从小生活工作在萧太后河与通惠河之间,现在的单位和家门口都紧邻坝河。我有时想,如果坝河要是能通航的话,我只需半天就可以到达张家湾。然后,从张家湾换船,又可以从萧太后河或者通惠河溯流回到京城。

毫无疑问,人类的生存历来是择水而居的。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无一不是如此。北京东南郊一带,在辽金甚至是元朝时期,还是蛮荒之地。自明朝朱棣到了北京以后,才陆续有了人烟,开

始形成大大小小的村落。譬如我 知道的常营乡,在“文革”前后,曾一度改名长营乡,这显然是违背历史的。相传,这个乡名字的由来,是因了明朝大将常遇春带领部队曾在这一带扎营,所以才叫常营。常遇春是回民,现在的常营乡居住的居民大多数是回族。我的高中同学,就有七个回族。至于通惠河南边的定辛庄村的由来,说出来更有意思。相传朱棣带着部队到达张家湾后,修整几日,然后准备一鼓作气,进攻北京。当部队走到定辛庄附近时,将士们有些劳累,有人提出能否休息一下。朱棣顺应民意,就说了句“在此定定心神也好”。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定心庄”,也就是定辛庄的村名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村名地名的由来,与真实的历史可能有些牵强附会,但作为一种口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

自2000年前后,北京东南郊通惠河、萧太后河两岸的农村陆续拆迁,置换的土地有的作为房地产开发,也有的变为城市绿化用地。经过多年的改造、腾退,现在的北京东南郊大部分村庄都已经消失,仅存的一些村庄也是家家户户盖满了房子,就等着拆迁时多分得一些经济补偿。当地老百姓都懂得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干了一辈子,

不如拆一回子。诚然,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农民往往因房多而一夜暴富。以我的见闻,许多农民拆迁后,有人买了汽车,也有人添置了高档家具,还有人到处旅游,当然,也有人因染上了赌博、吸毒等陋习,把到手的补偿款挥霍一空。作为普通人家,房屋多了,除了满足自己家庭居住外,绝大部分都选择了出租。每个月不论租两三千元,还是七八千元,贴补家用,终归是件好事。但问题是,房子是用来居住的,不是单纯用来炒钱的。我以为,人们在拆迁后,在保证基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外,作为新型农民,或者说新市民,在生活方式上除了得到物质的最大享受,是不是在精神上也要有所追求呢?譬如,在公共文化设施上,能否留有更大的空间和投入,能否让专业人才发挥作用,能否让群众文化有更大的舞台?就家庭而言,能否建家庭图书室、音乐室、美术室、京剧茶社等?过去人们常说,富不及三代,然而,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文化的需求提高了,其福祉泽被后人恐怕就不是三代了。因此,我要大声呼吁,富起来的人们,眼睛不要紧盯着眼前几张瓦片钱,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给文化,这可关乎我们后代的真正的百年大计啊。

金雀楼闲话

用心传承笔尖上的文化

党云峰

7月22日,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专业大一学生刘天逸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手抄繁体字课本的照片,他坐在铺满地的作业中间展示成果的姿态刷屏朋友圈。

大众在习惯用电脑码字之后,键盘正悄悄取代硬笔,以打字代替写字已经成为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纸化办公就意味着很多人在日常工作中除了签名已经不怎么用笔写点什么了。简体字都不怎么写了,更何况是繁体字。所以当听到有人手抄课本还是繁体课本的时候,自然会引发公众惊叹:这是磨洋工还是练内功?

据了解,刘天逸的老师陈士银不仅自己抄,还用繁体字授课。其实这在文科专业是普遍存在的授课方式,因为抄书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有其实际效果。例如在中文系,从《古代汉语》课本到《古代文学作品选》都是繁体字的,文史哲专业的很多参考书也是以繁体字印行的,识字是最基本的上课要求。认知是书写的基础,毕竟字不认识,书自然也就没法看,课也就没法上了。字体简化是中外文化发展的趋势,但如

今海量古籍尚无简体字版,作为专业性的要求,用简识繁甚至用繁无

可非议。从中文系的课本到哲学系的语言转向研究,从历史系的甲骨文识别到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从书法课堂到朋友圈的繁体字输入法,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史的传承正是在一撇一捺中积累的,因为很多书从字体、缺笔避讳就能判断出所处的年代。这部分工作需要文化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

手抄一直是人们阅读甚至获取书籍的途径。明代的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提到:“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冯其庸先生在2012年出版的《瓜饭楼丛稿》中谈及与红学的不解之缘时提到:“在‘文革’的高潮中,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头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

文化传承没有捷径,继承和发

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课题,文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所谓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正是汉字价值的重要体现。笔尖上的文化需要用手抄,更得用心写,日积月累的抄写、诵读是让其入脑入心的正途。通过抄古文可以熟练掌握繁体字,接下来才有练习书法的可能。在互联网时代,跟简体字、繁体字的疏离会让人对传统文化有隔膜,如今许多文化人有在公共场合用错词、闹笑话的现象,原因之一就是只认字却不懂啥意思,主观臆断而贻笑大方。这类识字

的文盲缺乏对文字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了解。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开始,各地举办、播出了众多读写汉字的活动、节目,正是因为大家认识到了文字传承的重要性,燃起了学习汉字的热情。文字事关文化赓续、文明传承,本应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本应是新闻的新闻成了新闻,正是当下提笔忘字的焦虑的直接反映。简体字和繁体字都需要守护者、传承人,文化的接力棒只能在路上,不能掉地上。

文化产业园区要实打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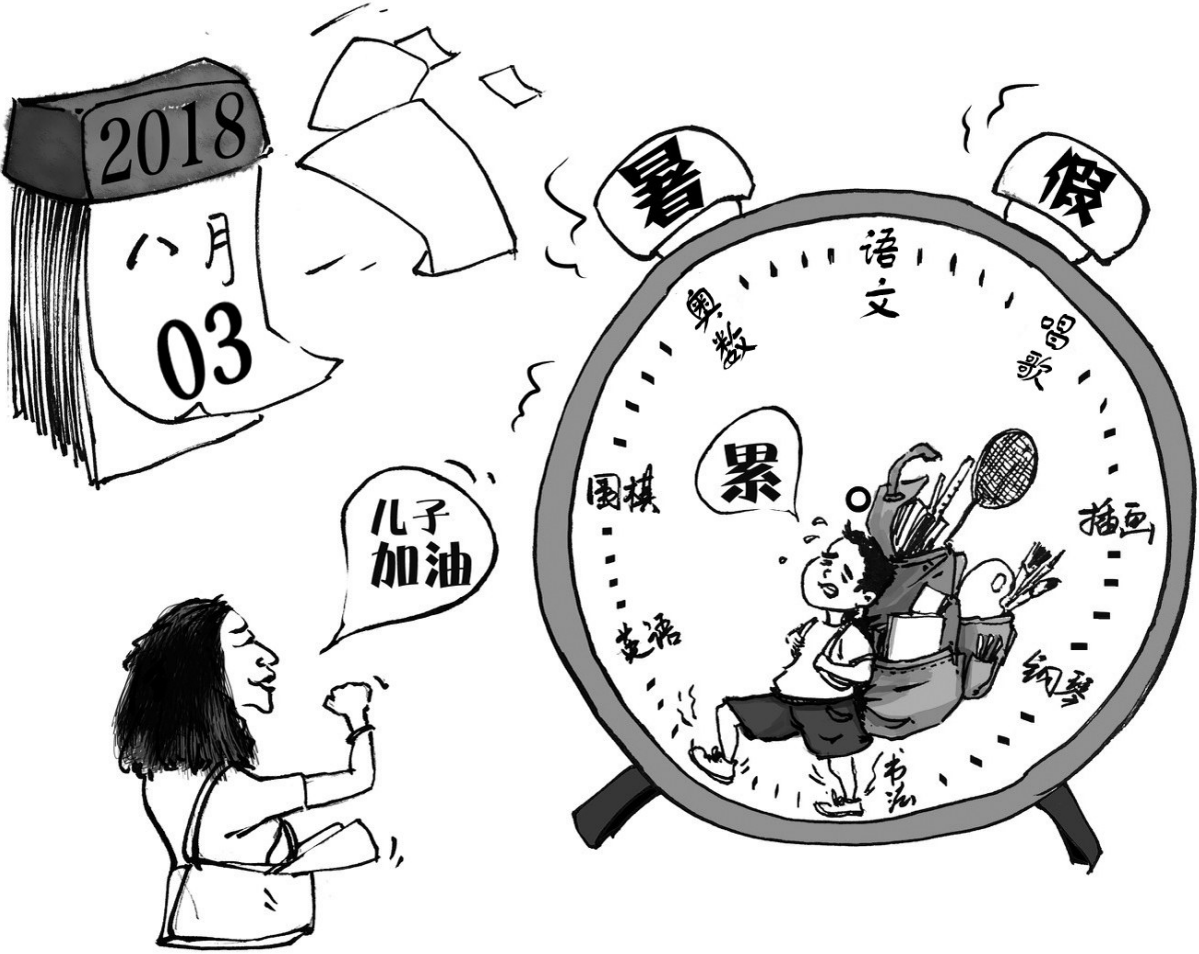
苏 锐

有积极推动作用。科学合理的园区发展规划,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政策激励、科学管理、协调服务、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同时,借助文化产业园区的平台,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引导创意、技术、资本、人才、信息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集聚发展,不断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拓宽盈利收益渠道,提高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

而建设好文化产业园区,应从优化结构布局、加强资源集聚、增强创意孵化等方面入手。一要合理确定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方向,明确园区的功能定位和特色产业,明确园区在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 and 角色;综合考虑产业政策、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潜力、区位优势等各方面因素,明确文化产业园区自身发展定位、文化主题和主导产业。二要增强文化产业园区内生机制,通过园区内部管理机制和中介组织最大限度的资源整合,使产业链条形成高度的专业化

分工和合作,实现园区整体外部竞争力和产业实力的提高。三要改变单一依靠“出租空间”营利的模式,不断优化创业创新环境,建设孵化器和创业加速器,孵化和培育一批优秀文化产业创业者和创业型企业;打造文化“众创空间”“创新工场”,推动文化产业园区技术研发、咨询服务、生产贸易、展示评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创业创新提供专业化服务。

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园区不能成为“空壳园区”“僵尸园区”。各地应避免一味追求建筑面积、投资规模等硬性指标,要以文化产业特性为根本,突出园区经营的文化内容、主业和特色,形成良性集聚的发展路径。相关方面需以满足园区内企业共性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目标,以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应用及公共设施共享为重点,鼓励园区建设创业孵化、融资推介、信息交流、人才培养、市场推广、管理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平台。



暑假来了,兴趣班、游学营,一个个被培训机构包装得“天花乱坠”的“进补”项目让家长挑花了眼。家长的出发点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然而过分的教育焦虑让家长在经济上不堪重负,还会将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繁重的课业容易让孩子滋生厌学情绪,导致揠苗助长的恶果。

鸬鹚天 漫画暑假

上紧发条关进楼,贪玩秉性要回收。未来休让童心误,大任终须汗水流。培训路,使人愁。少年从此低低头。拔苗助长谁知道,孩子天生爱自由!

黄卓/绘 何鹤/词

声音

文体不分家,关键在于如何结合

在真人秀、综艺节目等基础上加入体育元素,这种生硬的“嫁接”难获成功。一些体育节目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节目娱乐为先,多由娱乐节目制作团队操刀,简单请来体育明星,简单融入体育元素。

(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副研究员邓文卿评析文体融合 原载于2018年7月31日《光明日报》)

网络文学不要忘记带上使命和责任

网络文学作家应该跳出架空世界和自己的“小情调”,多关注现实生活,从中汲取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创作更多反映时代、贴近生活的优秀

文学作品,此外,还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类型化的叙事技巧。

(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吴正峻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采访时如是说)

儿童文学不能只给孩子吃甜的

“不能只给孩子吃甜的,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即便没有亲身经历,但是他看过了这样的故事,万一某天需要面对这些问题时,或许就能有更好的应对。”

(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在接受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国宝会“说话”,即使卖萌也有度

无论是卖萌式的宣传,还是拟人

化的表现方式,《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成功之处便在于用通俗的方式,拉近了文物与观众的距离。“透过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它的人,和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但我们也并不会刻意去讨好观众,即使‘卖萌’也会有一个度在那里。”

(《如果国宝会说话》纪录片总导演徐欢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如是说)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之心

“科学家之所以有很多伟大的发明,不是一开始就承载着什么使命,而是单纯的‘好奇’。所以我在5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督促自己,要更好奇。”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一场演讲中畅谈人生感悟)